

# 黎巴嫩真主党的复合身份、政治影响及发展前景

朱泉钢

**【内容提要】**黎巴嫩真主党自成立以来，逐渐从一支体制外的抵抗武装发展成为兼具抵抗武装、社会团体和合法政党复合型身份的组织。复合型身份增强了真主党的政治权威、能力和韧性，助力其成为黎政治格局中的关键力量之一。社会团体身份定位确保什叶派民众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支持基础，政党政治是真主党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抵抗武装成为真主党政治行动中的争议资源。2024年爆发的新一轮黎以冲突对真主党造成严重打击，使其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尽管如此，真主党的核心支持基础依然整体稳固，政治影响力仍然强大。未来真主党解除武装的压力与日俱增，复合型身份面临调整困境。

**【关键词】**黎巴嫩真主党 复合型身份 什叶派 黎以冲突

长期以来，黎巴嫩真主党的行为和形象饱受争议，一些人视其为破坏黎巴嫩主权的“民兵组织”，另一些人则视其为保护黎巴嫩安全的“国家英雄”。这种对立论述均未能把握该组织兼具抵抗武装、社会团体和合法政党的复合型身份特征，但也反映了真主党的复杂性质。2024年爆发的新一轮黎以冲突对真主党造成严重冲击，该组织面临严峻的内外困境，尤其是解除武装的压力空前增大。真主党通过巩固其核心支持基础，聚焦组织能力重建，展现出较强的政治韧性和组织生命力。然而，真主党虽继续坚持“抵抗”意识形态，但对使用武力表现得较为克制，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其抵抗武装身份。

## 黎巴嫩真主党的复合型身份

黎巴嫩真主党自1982年成立以来，从一支体制外的抵抗武装成长为兼具抵抗武装、社会团体、合法政党的复合型身份组织，其发展受到黎巴嫩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演进、真主党自身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真主党是作为抵抗武装成立的，长期担任该党总书记的哈桑·纳斯鲁拉指出，真主党诞生于1982年抵抗以色列的战争热潮中。<sup>[1]</sup>真主党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占领，但其深层原因更加复杂。第

一，什叶派的边缘地位和政治觉醒。黎巴嫩什叶派聚居在南部山区和东部贝卡谷地等欠发达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和政治弱势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穆萨·萨德尔为代表的教士加强什叶派政治动员，唤起什叶派的政治意识，1974年发起代表什叶派利益的“阿迈勒”运动。第二，国家崩溃与“阿迈勒”运动的失策。黎巴嫩独立后，采取教派分权体制，国家能力整体脆弱。1975年内战爆发后，黎政府陷入瘫痪，无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什叶派处境尤为艰难。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阿迈勒”运动被指默许入侵，其领袖纳比·贝里加入亲以的“民族救亡委员会”，这导致该组织在什叶派群体中的支持率暴跌。“阿迈勒”运动的副领袖侯赛因·穆萨维、纳斯鲁拉等出走，并成为随后创建的真主党领导核心。第三，伊朗与叙利亚的支持。由于反以的战略原因和部分宗教原因，伊朗和叙利亚扶持真主党。1982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协助下进驻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为真主党提供军事和政治培训，奠定其组织基础。

真主党创立后，为争取什叶派群体对其抵抗行动和意识形态的支持，逐渐发展出系统化的社会服务功能，具有社会团体的性质。1985—1992年，真主党的社会服务网络呈指数级增长，建立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社会事务部门、教育事务部门和伊斯兰卫生委员会三大板块。其中，社会事务部门下辖四大机构，即

建设圣战基金会、烈士基金会、伤员基金会和霍梅尼援助委员会；教育事务部门不仅运营收费低廉的“穆斯塔法”与“迈赫迪”等体系的学校，而且提供奖学金、教材补贴和图书借阅服务；伊斯兰卫生委员会负责管理多家医院、医疗中心、诊所和防疫部门。真主党的多数社会服务机构在政府部门

注册为合法的非政府组织，这种身份既为其提供法律保护，也便于与其他组织合作。<sup>[2]</sup> 真主党的社会服务起初主要针对什叶派群体，后逐渐扩展到其他教派民众，但通过提供社会服务维护黎巴嫩什叶派群体的利益始终是其核心任务。1982—1992年，真主党致力于武装抵抗以色列和为什叶派群体提供社会服务，以“重拾尊严”赢得基层支持，并通过反以抵抗行动扩大国内影响力，为1992年参选国民议会奠定了基础。

1992年，黎巴嫩举行1972年以来首次议会选举，真主党决定参选，初步确立了合法政党身份。这一转变缘于三方面因素：一是1989年《塔伊夫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民兵主导的黎巴嫩旧秩序终结和叙利亚监护下政府重建的开始，真主党虽获准保留武装，但认识到仅靠抵抗武装身份难以为继。二是1990—1991年以穆萨维和纳斯鲁拉为代表的新领导层推行务实的“开放政策”，获得真主党精神导师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及伊朗新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三是经12人委员会投票表决，真主党认定参选可获取合法身份、影响民生政策并促进教派合作等战略收益，最终以10:2结果决定参选。<sup>[3]</sup> 选举中真主党赢得8席，并与盟友组成12人议会党团，但拒绝入阁以抗议教派分权体系。1996—2004年，其国民议会席位保持稳定（1996年7席、2000年9席），地方选举表现超越“阿迈勒”运动，成为黎巴嫩的主导性什叶派政党。2005年黎巴嫩总理哈里里遇刺引发政治危机，叙利亚被迫撤军，黎巴嫩亲叙的“3·8联盟”（包括真主党、“阿迈勒”运动、“自由

爱国运动”等）与反叙的“3·14联盟”（包括未来阵线、黎巴嫩长枪党、黎巴嫩力量党等）形成对峙态势。真主党为更直接地维护自身利益，在2005年国民议会选举获14席后首次入阁，并掌控能源、劳动和农业部长职位，从有限政治参与转变为全面政治参与。

真主党从20世纪80年代信奉激进革命的抵抗武装，转型为20世纪90年代务实温和的政治实体，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参选参政到2005年入阁，展现了强大的环境适应力，形成了抵抗武装、社会团体、合法政党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身份，<sup>[4]</sup> 成长为兼具军事、社会和政治功能的组织。真主党复合型身份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实现组织生存和发展、维护和拓展什叶派群体利益的目标决定了真主党的整体战略方向，而黎巴嫩教派分权体制、协和式民主政体、易受外部渗透的三大政治特征，以及政治体系的脆弱性，既给真主党提供了发展空间，也带来了结构性制约。真主党的行为逻辑始终包含双重努力，即突破政治约束与威胁认知，同时捕捉机遇推进实现战略目标，这凸显了该组织战略目标的明确性与战略手段的灵活性。<sup>[5]</sup> 可见，真主党的复合型身份虽充满张力却又逻辑自洽，根植于特定的历史进程。

## 复合型身份对黎巴嫩真主党政治作用的影响

随着2008年《多哈协议》的签署，真主党成为黎巴嫩关键乃至首要的政治力量。协议赋予真主党及其盟



友 30 个内阁席位中的 11 个, 鉴于重大决策需获 2/3 内阁成员通过, 真主党掌握了“关键否决权”。此后, 真主党的国会影响不断扩大: 其领导的“3·8 联盟”在 2009 年议会选举中获 57 席, 2018 年增至 71 席并首次主导议会, 2022 年虽回落至 61 席, 但其政治影响力依然强大。<sup>[6]</sup> 与此同时, 真主党深度掌控政府组建进程。《多哈协议》签署后, 所有政府部门的组建都必须获得真主党支持或至少不反对。真主党还推动政治盟友“自由爱国运动”领导人米歇尔·奥恩在 2016 年当选总统。真主党自建立以来, 始终承受着黎巴嫩国内外相关力量的孤立和反对, 但其不仅成功抵御了攻势, 而且发展为黎巴嫩政治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这固然有地区力量复杂博弈、黎巴嫩国内政治脆弱等因素影响, 但真主党的复合型身份发挥了更大作用。真主党多次强调, 其政治活动是与抵抗身份、社会工作协同展开的。<sup>[7]</sup>

### 一、社会团体: 政治动员的支持关键

社会服务虽非真主党获取政治支持的唯一手段, 但在黎巴嫩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不健全的国家, 其作用尤为重要。作为具有高度凝聚力和层级结构的社会团体, 真主党具备优质服务供给能力。真主党运营着医疗、教育、物资援助、农业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小额信贷、体育青年俱乐部、媒体机构及宗教场所等多元化社会服务项目, 这成为其获取政治支持的关键。<sup>[8]</sup> 在不同历史时期, 真主党提供社会福利的覆盖范围不同, 但什叶派群体一直是其核心对象。真主党的社会服务网络不仅弥补政府留下的治理空白, 而且能够培养什叶派的忠诚, 真主党借此将民众的社会支持转化为政治资本。

总体来看, 占黎巴嫩人口 30% 以上的什叶派一直是真主党政治参与的稳定支持力量。知名民调机构“阿拉伯晴雨表”在 2024 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 真主党的支持基础主要位于黎巴嫩南部和东部, 以及首都贝鲁特南部的什叶派聚集区。在全国范围内, 有 30% 的民众信任或高度信任真主党, 但不同教派差别较大, 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基督徒表示信任或高度信任真主党的比例分别为 85%、9%、9% 和 6%。<sup>[9]</sup> 可见, 什叶派的支持不仅是真主党生存和扩张的基础, 而且是其进入选举政治时代取得成功的关键。

### 二、合法政党: 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

真主党作为合法政党融入黎巴嫩政治体系后, 凭借严密的组织结构、务实的意识形态、灵活的政治策略, 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第一, 严密完备的组织结构。真主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为由 7 人组成的决策协商委员会, 组织下设执行、政治、议会行动、司法、军事五大委员会。真主党采取垂直管理体系, 中央组织掌管党内事务, 地方设片区和小组, 基层党员须全程参与组织生活和承担日常党务。<sup>[10]</sup> 真主党组织严密, 确保其兼具组织凝聚力、行动效率和社会动员力。

第二, 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在真主党发展历史上, 1985 年的《公开信》和 2009 年的《宣言》是理解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文本。<sup>[11]</sup> 与《公开信》相比, 《宣言》依旧体现出反以色列反西方的色彩, 但也表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创新, 包括淡化建立伊斯兰秩序和使用暴力手段的色彩, 强调武装是国防体系的组成部分, 凸显其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角色转变。

第三, 灵活务实的政治策略。真主党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与政府对立, 到 90 年代参与国民议会和市政选举, 再到 2005 年入阁获得部长职位, 并通过政治联盟扩展影响力, 展现出政治策略的灵活性。真主党利用国家机构、行政工具及政治联盟来构建、维持和拓展影响力,<sup>[12]</sup> 以调配国家资源和引导国家活动服务于自身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

### 三、抵抗武装: 政治活动的争议资源

抵抗武装身份赋予真主党重要的军事资本和象征资本, 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资本。早期, 真主党不仅挺过了以色列旨在消灭它的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1993 年“责任行动”和 1996 年“愤怒的葡萄行动”), 而且在 2000 年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真主党在 2006 年黎以冲突中取得突出战绩, 其在国内和地区政治地位大幅提高。此外, 真主党在黎巴嫩塑造抵抗文化, 将军事抵抗扩展到文化抵抗, 最大程度地整合黎巴嫩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和获取政治支持。真主党不仅将什叶派历史转化为反抗暴政的悲情叙事, 通过抵抗的宗教阐释维系社会根基和构建身份政治, 使抵抗精神扎根于黎巴嫩的

国土防卫，塑造出抵抗的民族主义叙事，还通过批判国家经济困境和呼吁资源再分配等民粹主义话语，打造抵抗的经济叙事。<sup>[13]</sup>凭借武装抵抗和文化抵抗，真主党在黎巴嫩内外累积了巨大的政治威望和资源。

然而，真主党的抵抗武装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其政治负担。一方面，真主党成为合法政党后虽极少对内动用武力，但其非国家武装地位一直引发国内部分政治力量的担忧和恐惧。另一方面，真主党的军事行动虽为其带来政治声誉，但也导致其长期遭受以色列打击，加之参与叙利亚内战等，使其付出高昂代价。

总之，复合型身份增强了真主党的政治能力和政治韧性，但也给其带来一定负担。社会团体身份为真主党提供了深厚的民众根基与基层联结，既夯实其核心支持基础，又使其从支持者中获取政治权威。政党身份赋予真主党政治合法性，使其不仅具有获取更多资源的有效途径，而且通过组建政治联盟来削弱对手。抵抗武装身份既部分抵消了以色列的常规军力优势，又赋予真主党超越国内政治体系的战略自主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负资产。

### 新一轮黎以冲突背景下 黎巴嫩真主党的发展前景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因真主党支持哈马斯而跨境打击真主党，挑起新一轮黎以冲突。真主党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遭沉重打击，1.8万名成员死伤，70%的远程火力与大量资产被毁，社会服务系统遭严重破坏。<sup>[14]</sup>新一轮黎以冲突后，真主党面临严峻的内外

挑战。在外部，以色列多次违反2024年11月达成的黎以停火协议并持续打击真主党，抵抗阵线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而无力再向真主党提供实质性支持。真主党的内部困境更加严重，其社会团体、合法政党和抵抗武装身份均受到冲击。一是核心支持基础受损。新一轮黎以冲突对黎巴嫩造成严重损失，近2万人死亡，超百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约14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估算，黎巴嫩战后重建约需110亿美元。<sup>[15]</sup>从地理范围看，真主党核心地带的什叶派聚居区受损尤为严重。真主党支持者的怀疑和不满情绪有所上升，他们担心该组织无力提供安全保障、协助返乡和支持重建。二是政治地位显著下降。2025年1月，黎巴嫩举行总统选举。鉴于内外形势的变化，真主党无力再像2016年那样强推其属意人选，最终不得不支持亲西方的约瑟夫·奥恩当选。2月，纳瓦夫·萨拉姆在未获什叶派政党支持的情况下出任总理，并成立了一个由24名部长组成的新内阁。此次政府组建未遵循自《多哈协议》以来真主党的“阻断性1/3否决权”原则，标志着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局及其传统盟友影响力的下降。三是解除武装压力骤增。在美国压力下，2025年8月5日和7日，黎巴嫩内阁两次召开会议，最终投票通过美国提供的包括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在内的停火方案，其核心内容是逐步结束所有非国家武装团体（包括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的武装存在，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停止空袭等。黎巴嫩内阁要求政府军须在8月底前制定收缴各派武装武器的计划，并于2025年底前完成实施。

面临生存压力和身份困境，真主党多措并举进行新一轮政策调适。第一，努力巩固核心支持基础。真主党



2025年10月20日，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军事设施。

高度重视什叶派聚集区的重建工作，该组织长期通过发放烈士家属抚恤金、战争损失补偿等经济手段巩固群众基础。即便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真主党仍投入巨资支持重建。截至 2025 年 1 月底，真主党称已向 14 万民众发放 4 亿美元赔偿金。<sup>[16]</sup> 由于黎巴嫩政府在战

后重建工作上的严重滞后，引发什叶派民众的普遍不满。在此背景下，真主党积极运用其政治影响力，持续向政府施压以加速重建进程。第二，快速适应政治弱势地位。在新一轮黎以冲突中，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和潜在继承人哈希姆·萨菲丁等不少党内中高层领导身亡。真主党迅速选举长期担任组织副职的纳伊姆·卡西姆作为新领导人，并对空缺的政治和军事中层领导职位进行补充，确保组织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同时，在丧失“自由爱国运动”等传统盟友支持的背景下，真主党进一步加强与什叶派盟友“阿迈勒”运动的协调和团结，以确保继续对黎巴嫩政局施加影响。第三，积极塑造国家安全维护者形象。真主党强调，2023 年 10 月 8 日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是为阻止以蓄谋入侵黎巴嫩，以色列并未达成消灭真主党的战略目标。其接受停火并非屈服于以色列的军事压力，而是应黎巴嫩政府请求的让步，旨在避免更多民众遭以军杀害。<sup>[17]</sup> 真主党批评以色列频繁违反黎以停火协议，持续占据黎巴嫩南部 5 个据点，坚持反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以此显示对黎什叶派群体和国家安全的保护作用。第四，反对解除其武装的计划。真主党避免与政府直接冲突，坚持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 1701 号决议和黎以停火协议，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与政府军协调。然而，真主党反对彻底解除武装。在内阁批准解除真主党武装后，现任真主党总书记卡西姆发表强硬讲话，重申除非以色列完全撤军、停止攻击并释放战俘，否则绝不交出用于威慑以军的武器。此后，他还表示只要侵略和占领持续，真主党就绝不会放下武器，必要时将不计代价进行对抗。<sup>[18]</sup>

当前，真主党的核心支持基础整体稳固，政治影响力依然强大，但其解除武装的压力显著增大，复合



2025年8月8日，黎巴嫩贝鲁特，黎巴嫩内阁投票通过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的黎以停火方案，引发真主党支持者的抗议。

型身份面临调整困境。一方面，什叶派民众对在教派分权体制中重回边缘地位的恐惧，以及真主党 40 余年的社会运动成就，使其群众基础并未崩溃。纳斯鲁拉遇刺 5 个月后的 2025 年 2 月 23 日，数十万人参加了他在贝鲁特的葬礼游行，表明真主党的社会根基依然牢固。2025 年 5 月中下旬，黎巴嫩举行市政选举，真主党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内表现依旧强劲。在贝卡谷地，由真主党与“阿迈勒”运动组成的“发展与忠诚联盟”所向披靡。在首都贝鲁特，真主党尽管未直接参选，但它支持的“贝鲁特团结”名单赢得市议会多数席位。在黎南部 144 个选区中，72 个选区因内部协议未举行投票，其中 71 个由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组成的联盟控制。<sup>[19]</sup> 真主党通过联盟合作实现对什叶派聚居区市政体系的全面掌控，体现出较强的基层控制力和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史无前例的内外压力下，真主党不得不权衡是否调整武装身份以保全未来。真主党的抉择不仅关乎自身存续，而且将深刻塑造黎巴嫩乃至中东的未来秩序。

整体来看，真主党有两种选择。一是坚决保留武装，或将与军事占优且获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再启战端。这意味着真主党将面临更严重的内外压力，组织危机将进一步加剧。二是通过谈判解除武装，分阶段放弃武器，换取以军撤离、政治安全和重建支持。这将改变组织身份，淡化武装色彩但保留政治和社会角色。真主党虽拒绝在“敌人压力下”解除武装，反对外部时间表，但并未彻底否定解除武装的选项。然而，当前美国和以色列等外部势力阻挠妥协方案和逼迫真主党让步的举动，并不符合黎巴嫩“无胜者无败者”的政治危机解决传统和对立双方的对话协商条件，<sup>[20]</sup> 只会使黎巴嫩局势变得更加危险，甚至陷入内部冲突。

## 结语

历史地看，真主党的复合型身份赋予其较强的生命力、适应性和坚韧度，确保了其在什叶派内部的核心支持基础及在黎巴嫩的政治影响力。然而，新一轮黎以冲突爆发后，面对国内外要求解除武装的巨大压力，真主党很难像之前那样掌控武装，很可能会通过淡化武装身份来换取政治利益，这也将成为影响该组织未来身份定位和发展的关键变量。不过，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去向等细节并未确认，羸弱的黎巴嫩政府及其军队是否有能力完成真主党武装收缴，以色列能否履行撤军和停火承诺以及真主党的要求能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满足等不得而知。可以肯定，最终结果将受到中东地区局势、黎巴嫩国内政治博弈和真主党内部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C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东国家军政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4BSS0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

[1] 李福泉：《黎巴嫩真主党政治参与解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4期，第47页。

[2] Shawn Teresa Flanigan, Mounah Abdel-Samad, “Hezbollah’s Social Jihad: Nonprofits as Resistance Organiz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Vol.16, No.2, 2009, pp.122-126.

[3] Eitan Azani, *Hezbollah: The Story of the Party of Go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241.

[4] 李福泉：《真主党的发展演变与黎巴嫩政治前景》，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第69页；李海鹏：《黎巴嫩真主党：“国中之国”，还是大国博弈“代理人”？》，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6期，第9页。

[5] Adham Saouli, *Hezbollah: Socialisation and Its Tragic Iron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9, p.9.

[6] 朱泉钢：《中东地区国家政党政治发展与研究》，载周淑真主编：《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022-2023）》，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113页。

[7] Joseph Alagha, *Hizbullah’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79.

[8] Melani Cammett, “How Hezbollah Helps (and What it

Gets Out of it),” October 2,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4/10/02/how-hezbollah-helps-and-what-it-gets-out-of-it/>.

[9] Mary Clare Roche and Michael Robbins, “What the Lebanese People Really Think of Hezbollah,” July 12,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what-lebanese-people-really-think-hezbollah>.

[10] Aurélie Daher, *Hezbollah: Mobilisation and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127-149; [叙利亚]肖克（Karim Alwadi）：《真实的黎巴嫩真主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63-76页。

[11] Dominique Avon and Anaïs-Trissa Khatchadourian, *Hezbollah: A History of the “Party of Go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03-162.

[12] Imad Salamey,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Lebanon*, New York: Peter Lang, 2021, p.155.

[13] Abed Kanaaneh, “The Hegemony of Resistance: Hezbollah and the Forging of a National-Popular Will in Lebanon,”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33, No.1, 2023, pp.3-24.

[14] “Hezbollah Chief Says Missiles Will Fall on Israel if it Resumes War on Lebanon,” Reuters, August 6,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hezbollah-chief-says-missiles-will-fall-israel-if-it-resumes-war-lebanon-2025-08-05/>; Lara Sukster Mosheyof, “Hezbollah’s Arsenal Now a Liability, Say Arab Generals,” August 3, 2025, <https://www.jfeed.com/middleeast/hezbollah-missile-arsenal-decline>.

[15] “Lebanon’s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Needs Estimated at US\$11 Billion,” WB, March 7, 2025,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5/03/07/lebanon-s-recovery-and-reconstruction-needs-estimated-at-us-11-billion>.

[16] Orna Mizrahi, “The Political Shift in Lebanon-Challenges for Israel,” February 6, 2025,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new-lebanon/>.

[17] David Daoud, “Analysis: Naim Qassem on Hezbollah’s post-ceasefire Posture,” December 7, 2024,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24/12/analysis-naim-qassem-on-hezbollahs-post-ceasefire-posture.php>.

[18] “Hezbollah Says Govt ‘Handing’ Lebanon to Israel, Refuses Disarmament,” August 15, 2025, <https://www.newarab.com/news/hezbollah-accuses-govt-handing-lebanon-israel>.

[19] Tal Beeri, “The Municipal Elections in Lebanon-Hezbollah Is Here to Stay—Analysis of the Results,” May 26, 2025, <https://israel-alma.org/the-municipal-elections-in-lebanon-hezbollah-is-here-to-stay-analysis-of-the-results/>.

[20] Augustus Richard Norton, “The Role of Hezbollah in Lebanese Domestic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42, No.4, 2007, p.490.